

抗日戰爭中的重慶



87
K297.13
7
2

黄友凡 彭承福 等著

抗日我多不敗重慶

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抗日战争中的重庆

黄友凡 彭承福等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重庆 北碚)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5印张 插页2 148千字

1986年7月第一版 1986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60册

统一书号: 3405·4 平装定价: 1.17元

前 言

重庆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中国的战时首都，它是大后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所在地，也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在远东的指挥中枢。因此，无论是在中国现代史、还是在世界现代史上，重庆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八年抗战中的重庆人民，在大半个中国沦入敌手、沿海工业相继被日寇摧毁殆尽的情况下，不畏流血牺牲，担负起了生产军需、民用物质的重担，他们克服了日机轰炸、物价飞涨、工资低微等艰难困苦，坚持工农业生产，保证了战争供给，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有力地支援了长期抗战，对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篇章。

《抗日战争中的重庆》这本文集，以丰富的史料为依据，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展现了战时首都——重庆在政治、经济、交通、教育、文艺等领域的历史风貌；总结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在统一战线、群众运动等方面的历史经验；论述了重庆各政治派别、各阶层人民对抗战所作出的历史贡献。

这是我国第一本较为全面地反映抗战时期重庆概况的文集。它的出版，为史学工作者研究抗战时期重庆的历史、研究中国人

民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提供了有利条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由于资料发掘尚待深入，加之我们水平有限，因此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学者和曾经生活、战斗在重庆以及一切关心重庆的同志们批评指正。

《抗日战争中的重庆》编辑组

一九八五年十月

目 录

八年抗战是爱国主义的伟大胜利	黄友凡	1
重庆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地位和作用	彭承福 贺德群 刘学良 胡康民	16
抗战时期的重庆经济	杨选成 唐洪英	45
抗战时期重庆民族工商业之消长	单翥凤	68
抗战时期的重庆教育	艾新全	85
川江航运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廖笃琼 杨淑珍	100
周恩来的交友之道		
——试论周恩来在抗战时期关于交		
朋友的理论与实践	胡康民	117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在重庆对外国人士的		
统战工作	王光荣	130
重庆救国会与重庆抗日救亡运动	蔡佑芬 李代淑	141
抗战时期重庆工人运动刍论	黄淑君 杨光彦	157
重庆妇女对抗日战争的贡献	李九荣 马淑珣	178
重庆人民的反空袭斗争	刘志健	191

八年抗战是爱国主义 的伟大胜利

黄友凡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四十年前的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宣布停战诏书的形式，宣布了日本无条件投降。九月二日，日本天皇和政府代表，以及日本大本营的代表，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至此，日本帝国主义所进行的野蛮侵华战争宣告彻底失败，中国人民坚持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赢得了最后胜利。

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大书特书，永志纪念。这是因为：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一次全民抗战，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它为后来的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抗日战争又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亚洲大陆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的胜利，为世界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树立了一个弱国打败强国、正义战胜邪恶的光辉榜样。

中国抗日战争经过八年苦战能够获得最后胜利，决不是偶然的。关于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曾经有过两种说法，一是认为英美盟军移师东向，对日作战，特别是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的两颗原子弹；一是认为苏联出兵东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显然，这两种说法都是片面的，不符合实际的。不可否认，美英盟邦的配合与援助，苏联红军出师东北，对于促进日本投降，加速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强有力的作用，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决不是决定的根本的原因。按照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按照中国抗战的实际情况，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是抗日的主力军，是东方反法西斯的先锋。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整个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团结抗战，才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最根本的、决定性的因素。从我们内部来说，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它表现出来的高度爱国主义精神，这是一种不可估量的精神力量。没有这个力量就不能坚持并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因此八年抗战的胜利，也可以说是全民族爱国主义的伟大胜利。

什么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就是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列宁曾经说过：“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对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②，在抗日战争期间，中日民族矛盾上升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下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各个阶级，各个党派和政治团体的利益，都必须服从民族利益，都不能超过民族利益，这是一个共同的最高原则。全国人民坚信民族的独立、解放，祖国的生存、利益和荣誉高于一切，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忠贞为之奋斗。一切为了抗战，一切为了

民族的解放，这是抗战时期中国人民的伟大历史任务，也是爱国主义的中心内容。在抗日战争中，周恩来曾经写了《民族至上与国家至上》的社论，对处在被压迫民族地位的民族和国家，作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解释，从而对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作了精辟的阐发，他指出：“首先应该认清中华民族是处在被压迫民族的地位，他要从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自求解放，尤其在今天，他要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自力更生，从抗战中达到解放之路。所以‘民族至上’的口号就等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他是被用来动员全中国被压迫民族向着主要的民族敌人——日寇，作生死存亡的决斗的。在这个意义上，一切个人利益、阶级利益、党派利益，都应服从总的民族利益。为民族利益而奋斗牺牲，是中华儿女今天最光荣最主要的任务。”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组织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向人民群众宣传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全体党员，既是国际主义者，又是爱国主义者，要“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③

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侵略下忍受着最大的屈辱，过着血泪斑斑的奴隶生活，“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从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到八国联军，一次侵华，就是一纸不平等条约，就是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五十年来一直妄想吞并中国，称霸世界，“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这个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是中国人民所熟知的，日本鬼子也是这样干的。从“九·一八”“一二·八”到华北事变，到芦沟桥事变，人们痛感山河破碎，和当亡国奴的悲惨命运，我们的先辈们，抱着“雪我国耻，光我民族”“驱逐倭寇，还我河山”的夙愿，憋着一肚子仇恨，同帝国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斗

争，因而出现了东北抗日联军，“一二·八”上海抗战，绥远抗战，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上海的救国会七君子，以及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战争的转折点。千百年来，中国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彪炳千古的爱国运动，和无数英雄人物的壮烈事迹形成了我们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一部中国近代现代革命运动史，就是一部近代现代的爱国运动史。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

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三九年就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④。这是对中国人民百年来反抗侵略斗争的总结，也是对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歌颂。正是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中国抗日战争中，得到了高度的发扬。芦沟桥事变前后，一个东方巨人发出了震撼山河的怒吼：“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从东北到西南，从黄河到长江，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抗日救亡运动汹涌澎湃，抗日救亡歌声响彻云霄。当时重庆，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学生救国联合会，妇女界救国联合会，职业青年救国联合会，文艺界救国联合会，工人救国会，自强读书会，民众歌咏会，课余农村宣传队和怒吼剧社等，加上《新蜀报》《商务日报》等报刊的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席卷山城。成百上千的宣传队在工厂、农村、街道，用传单、标语、墙报、戏剧、歌唱、讲演等形式，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宣传，为了支援前线，发动了义卖、献金、招募

寒衣和慰劳抗日将士等活动。牛角沱地区的几个工厂组成“钢铁义卖团”，每人献出一天工资作基金，在本市流动义卖，将所得四百六十元支援前线将士。国光玻璃厂工人七十余人素食一日，将所得三百二十元慰劳前线将士。重庆各界到一九三八年一月止共募得寒衣捐款二十万元，棉背心四万余件。在街道、在农村，出现了敲锣打鼓欢送壮士出征的场面。⑤

“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而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激励着四亿五千万炎黄子孙，考验着每一个中华儿女。抗日的洪流冲击着一切，大振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大灭了崇洋恐日、因循自私、萎靡不振、散沙一盘的旧习恶风。过去外国人讽刺我们是“五分钟的爱 国热情”，现在却是全民抗战，持久抗战，一下子打破了日本鬼子“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爱国主义鼓舞、推动人们去进行殊死的斗争，为中华民族写下了千古不朽的史诗。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忠贞为国，自我牺牲的精神。抗战一起，全中国人民“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共赴国难。“前方流血，后方流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民族存亡，在此一举”，成为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八年抗战中，中国人民承受了惨重的牺牲，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据统计，中国伤亡人数达二千一百万之多，其中死亡就达一千万人，占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五千万死亡人数的五分之一，财产损失达六百亿美元。无论正面战场或敌后战场都经过一些大的战斗，如淞沪之战，台儿庄之战，平型关大战，百团大战等，广大爱国将士英勇杀敌，浴血奋战，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提高了全民抗战的信心，涌现了无数的抗日民族英雄。“男儿身当

为国死，不灭倭寇誓不还”，就是万千无名英雄的誓言。沦陷区人民的牺牲是无法算计的。象南京大屠杀中集体屠杀毁尸灭迹的十九万余人，零散屠杀的十五万余人，总计三十四万余人，这仅是法西斯暴行的一例，闻之令人发指。《四世同堂》电视连续剧，再现了沦陷区人民的真实生活，我们看到敌人的极端凶残，一小撮汉奸、民族败类的可耻行径。我们更看到一些知识份子、青年学生、普通老百姓默默进行着的爱国斗争，“千里刀光影，仇恨满九城”，像钱家父子、祁家祖孙、小崔长顺那种气吞山河的形像，不愧是炎黄子孙。

四川是抗日的大后方，重庆是中国的战时的首都，对抗战作出了特有的贡献。直到抗战结束止，四川征兵额达到三百零二万五千多人，民工服役总数也在三百万人以上，而征粮购粮借粮总额达八千四百四十三万石以上，占全国征粮总额的三分之一，各种捐税捐献，最大部分也由四川人民负担。《新华日报》为此写了《感谢四川人民》的社论。川军，过去名声不太好。这次出川杀敌，为国效劳，参加淞沪、太原、徐州等二十余次大的会战，死亡二十六万三千余人，负伤三十五万六千余人，失踪二万六千余人，共计六十四万六千余人。川军将领代军长王铭章，师长饶国华，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师长许国璋都在战场上为国捐驱，第七战区司令陆军上将刘湘也在抗战途中不幸殉职，有名的山东滕县之战，王铭章率部死守滕县，血战三昼夜，与其三千将士壮烈牺牲，为祖国立了功，为四川人民争了光。

日寇为了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对四川、重庆施行了飞机大轰炸，四川一百零八个县，几乎很少幸免。重庆是轰炸的主要目标，曾经遭受了很大的牺牲。从一九三八年十月起到一九四三年八月止，日机轰炸重庆二百一十八次，飞机九千五百一十三

架次，投弹二万一千五百九十三枚，炸死一万一千八百八十九人，炸伤一万四千一百人，毁房一万七千六百零八幢，仅工商界直接损失就达五百万美元。一九三九年“五三”、“五四”大轰炸，敌机七批六十三架，投弹二百九十二枚，炸伤二千二百八十七人，炸死三千九百九十一人，毁房四千八百七十一幢，重庆一片火海，中心区街道尽成废墟，尸陈街市，血肉横飞。一九四一年日寇又对重庆进行夏季大轰炸，轮番空袭，昼夜骚扰。从八月十日到十三日，市区发空袭警报十三次，时间长达九十六小时。八月重庆连续六天遭到轰炸，最多出动飞机一百三十五架，每次投弹四百枚以上，总共伤亡一千一百三十七人^⑥。重庆在日机“疲劳轰炸”之下，六月五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和平隧道大惨案，造成几千群众在防空洞内窒息而死，朝天门码头，尸堆成山，很多老百姓全家无一幸免。这件惨案，现在想起来，还是毛发悚然。在如此惨重牺牲面前，重庆人民并没有被战火和轰炸所吓倒，抗战意志也并没有因此挫伤，只要警报一解除，工人照常生产，商人照常开业，学校照常上课，旧的市场炸毁了，又建起了新的市场，夜市如昼，一派战时景象。重庆的消防警察，医护人员，群众救护队，不顾生命危险，及时救火救灾，抢救伤员，自来水公司和电力公司的工人，警报没有解除就加紧抢修水电设施，以保证工厂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用。重庆工人以大局为重，为了生产抗战军用物资，一般每日做工都在十小时以上，有的工厂机器在山洞里，没有发电设备，点油灯干活，有的兵工、钢铁厂，就是飞机临空也照常坚持生产。例如渝鑫钢铁厂从一九三八年七月开工到一九四二年一月，共遭日机轰炸五次，厂房与工人宿舍损失很大，但工人们克服困难，每月生产灰口铁一百四十吨，各种钢材一百吨，还生产大量耐火砖，支援了抗战^⑦。又如民生轮船公司的船只和

川江木船运输工人，为了抢运抗战物资，就是空袭警报，也从不停止航运。

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持了重庆人民？就是为祖国为民族的献身精神、牺牲精神。“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誓死保卫祖国，不做亡国奴”，这就是人们的理想、信念和思想感情。当时人们受到战争的教育，都懂得一个朴素的真理：“前方保卫了后方，后方应该支援前方”，“一天不打败日本鬼子，人民一天不安宁”，这就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结合起来了，表现出中国人民和重庆人民的高度爱国精神。

第二，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八年抗战是中国人民最困难的时期，特别是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内出现了空前投降危机和空前抗战困难。敌人采取了诱降和分裂的政策，国民党的反共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一九四一年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同时以二十万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而敌人以主要兵力对付我八路军、新四军，对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环境极为艰苦。朱德同志曾经写道：“特别在抗战第四年，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更为重大，斗争也愈加艰苦”。“我们觉得可以告慰全国同志的，就是八路军、新四军在这种艰苦的困难的环境下面，在弹药接济完全断绝，胜利地坚持了敌后抗战，北至冀东，南至上海，西至黄河，什么地方有敌人，什么地方就有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又说“我们坚持敌后抗战还有一个最大的困难，这就是我们是没有后方接济的。我们已经两年多没有领到一颗子弹，七个月没有领到一文钱的军饷，我们依靠民众渡过了一切难关，没叫苦，也没有饿死”^⑧。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成为中流砥柱，抗击了在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立下了赫赫战功，日本众议员微中利一悲观失望的

叫嚷“要想消灭中共军，则必须依靠百年战争才能解决”^⑨。为什么人民军队没有被困难所征服，反而由弱到强，由小到大，得到发展呢？应该说是依靠了军民团结，发扬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以及全体将士艰苦卓绝、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气概。

在抗日大后方的重庆，由于国民政府一些官员贪污腐化，四大家族巧取豪夺，官商奸商囤积居奇，利用抗战大发国难财，造成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国民政府搞了专卖政策，把关系人民生活的糖、盐、火柴、卷烟、棉花、棉纱、棉布都实行专卖，四大家族就利用专卖，低价收购，高价出售，大赚人民的血汗钱，国民党对公务人员还实行了配给制度，规定每人每月发售一定数量的平价米、平价布、平价煤，名为平价，实际也要处处塞包袱、送人情，才能到手。在农村就是田赋征实，还有征购、征借等等，把农民的收成掠夺去百分之五十。

物价飞涨，一日数变，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就大发票子，结果物价继续上涨，形成恶性循环，人民遭殃。据国民党官方公布的数字，抗战八年共发行法币十万三千一百九十亿元，与抗战前发行的十四亿元相比，激增七千三百倍^⑩。他们除了在美国印钞票外，在重庆有两个钞票印刷厂、机器昼夜开动，也不能满足需要。八年抗战期间，以一九三七年六月为基础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法币发行增加三百九十四倍，物价上涨一千五百八十五倍^⑪。至于法币贬值的情况，美联社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发表了一个材料，说明法币一百元可买的物品，一九三七年为二头牛，一九三八年为一头牛，一九四一年为一头猪，一九四三年为一只鸡，一九四五年为一条鱼，一九四六年为一个鸡蛋，一九四七年仅为三分之一盒火柴了^⑫。

物价飞涨，老百姓生活不下去，服毒自杀、投河吊颈者有之，卖儿卖女、沦为娼妓者有之；士兵及公务人员待遇低微；饥寒交迫；有名的文化人洪深生活不下去全家服毒自杀，周恩来同志送钱接济，才得挽救；有个留法工程师叫郝贵林，由于长期失业，无以维生，在中山公园公共厕所上吊自杀，成为轰动重庆的一条社会新闻。

尽管国统区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许多人衣无二件、粮无隔夜，许多人典当度日，一贫如洗，而我们的工农基本群众、公务人员、知识分子却是爱国不渝。他们廉洁奉公、严肃工作、茹苦含辛，咬紧牙关过日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抗战早日胜利。在重庆的一些进步人士、共产党员，常常是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有钱大家用，一个人有职业就养活几个穷朋友。就这样生活，大家还是穷且益坚，不减爱国之志。

“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是我国人民长期形成的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在抗战当中发展为延安作风，因为“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⑮。为了克服经济上物资上的极度困难，党中央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大大改善了军民生活。这种延安精神在大后方，又表现为红岩精神和“新华”作风。当时南方局和《新华日报》工作人员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但他们安贫乐道，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没有停止过战斗。《新华日报》有一篇《峥嵘岁月》的回忆写道：“《新华日报》馆工作人员的生活是艰苦朴素的。特别是‘皖南事变’后有一段时间，经济十分困难，每天只能吃素菜淡饭，报馆的同志除一部份工人同志每月发给很少的一点薪金外，一般人从上到下都只领一点生活津贴，尽管生活很苦，大家毫不在乎，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每当工作之余学

习会，歌咏会，篮、排球活动，墙报、下棋，各种活动非常活跃，逢年过节还要演出话剧”。在紧急疏散的日子里，许多同志赋诗言别“待他年胜利重逢时，试比谁英杰”，表现了《新华日报》工作同志的豪情壮志^⑭。广大人民的艰苦生活和他们的精神状态，特别是当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延安精神大加发扬时，人们深切地感受到“抗战必胜，曙光在前”。

第三，团结抗战，共御外侮的精神。团结是抗日战争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抗日战争应该是始于团结，终于团结，团结是全国人民抗日的基础，也是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基础”^⑮，因此，“要百倍加强内部团结，包括党内的团结，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这是克服一切困难能够坚持的中心关键”^⑯。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首先是国共两党的合作，击退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订出了“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分化和打击顽固力量，也就是联合大多数，反对少数和打击最顽固的力量的方针”^⑰。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长期战斗在重庆。周恩来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持国共合作，亲自作国民党人士的工作，作各民主党派、民族资本家，地方实力派的工作，作海外爱国华侨、各民族代表人物、宗教界人士的工作。他还利用各种场合、运用各种形式包括“红白喜事”作团结工作。如为郭沫若、沈均儒、洪琛、冯玉祥等祝寿。又如开追悼会、致悼词，发唁电，曾为张冲逝世送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词，并在追悼会上演讲，先后发表了《悼张淮南（张冲）先生》、《追念张尽忠上将》等文电。周恩来还在民生路《新华日报》营业部楼上每晚接待各方面人士，讲形势、讲抗战、讲团结，废寝忘食、